

昨天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

麦天枢 王先明

长篇历史报告文学

昨天

—— 中英鸦片战争纪实

麦天枢 王先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李昕 刘茵 高贤均

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

Zuo T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35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5 $\frac{7}{8}$ 插页2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130

ISBN 7-02-001422-3/I·1294 定价 8.30 元

序

李 昕

编辑们常有一种职业敏感：一听到书稿的题目，便能想象和判断它的内容和形式。但当《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这一选题送到出版社时，作为编辑的我却生出几分困惑。我不能想象，一百五十年前的历史如何能“纪实”？直觉使我把它当作了某些小说、电影、电视剧之类的虚构多于史实的货色。然而，在我展读作品之时，这种妄加判断所得出的印象顿时烟消云散。我惊异地发现，这竟是一部几近于“无一字无来历”的严格纪实之作，其史料之翔实，分析之严谨，使它既是一部富于学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学术著作。而仅此一点，便显示出它的某种卓尔不群、独立不依的价值和特色：或曰它加大了报告文学的思想容量和理论内涵，或曰它丰富了学术著作的文学表现技巧和手段，若不是两者兼而有之，便注定是两者必居其一。于是，这种形式的创造首先强烈地吸引了我，使我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个半世纪以来，对鸦片战争这一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阐释、分析和总结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从中学教材开始，举凡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很少不述及鸦片战争，以致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自以为了解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基于这种现状，本书若仅靠艺术形式方面的某种创新，自

然是不够的。面对作品，人们将更关心它在内容上有无份量和是否别开生面。我深知，两位甘于吃苦的作者为自己选定了一个极难讨好的题目：只有具备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的眼光、脚踏实地的思想，他们的作品才有可能从众多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中脱颖而出，获得社会的承认。

我庆幸，事实正如我所期望的。

在这里，我似乎已没有必要强调这部作品作为“第一部”全景式地反映鸦片战争的纪实文学的意义。因为对它，可说的很多。

—

两位精力旺盛、才华横溢的青年作者，是决不肯步他人后尘的。若不是为了创作别具一格的作品，他们决不会灵机一动就心血来潮地动笔。但既然要写，该从何处入手呢？

作者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文化。

不难理解，鸦片战争这个对中国人民意味着耻辱和灾难的历史事件包含着两个认知层面：政治的和文化的。在政治层面上，这场战争是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是军事力量的侵略和反侵略的对抗，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却是东西方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的碰撞，是两种特质相异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前者刀光剑影、短兵相接，其过程明晰简单，不难获知；后者却常常若明若暗、无形无迹，其表现复杂微妙，深奥莫测。对前者，人们在描述和分析时尽可作出道德评价（当然也不能仅止于此），因为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判断，本身需要以人类理想的道德规范（善）为准绳。但对后者，由于两种文化体系

得以存在和发展皆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它们的冲突，需要以符合人类天性及民族的生存发展规律的尺度加以评判，道德评价常不适用。可是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一些学者对鸦片战争的研究总是偏重于前者而忽视后者(暂且不提前几年那些以“文化反思”为口号全面否定民族文化传统的论著)，致使这种研究未免失于单调和狭窄。特别是有的学者将道德的裁判功能加以夸大，于是便出现了为贤者讳、历史材料为我所用等等流弊，自不待言。然而，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毕竟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全面亮相，它与西方文化的交锋使它从此打开了独立封闭的体系而开始了与西方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西方文化是一面镜子，使中国文化(当然也是一面镜子)具有了反观自身的可能。这一历史性巨变所造成的精神影响远较物质的更多。所谓精神影响，自然不单纯是政治的，也不仅仅是道德的，它还包含更多的有关民族生存和发展方式(属于文化)的内容。因此，对鸦片战争加以文化的剖析，便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本书作者指出：“不从东西方文化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重新了解鸦片战争，我们就难以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这表明，他们之所以要为历史开辟文化视角，恰恰是由于他们对现实的关注。略具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化相对于政治，在历史的变革中总是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曰惰性)和保守性的，这也便是文化得以成为民族传统的重要原因。所以，鸦片战争迄今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对于政治制度的几番沿革，它是漫长的；但对于相对风平浪静时常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变迁，它又显得短暂。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把鸦片战争称为“昨天”，意在强调它与今天之不可分割的文化联系，以便使之成为今天的镜子。而作者的落笔，则是处处着眼于文化。他们在详尽描述鸦片战争

全过程的同时，着力揭示的是这场战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后果。由于文化视角的切入，历史线索得以重新梳理，枯死的史实被赋予了鲜活的文化意义，由此而来的，便是足以充实和丰富以往史学研究成果的大量颇具启发性的新颖见解。从这里，作者把人们引向了一个早已为他们所熟知的物体的另一侧面，使人们不得不感叹自己以往的短视和孤陋寡闻。由于历史神奇地转化为“新闻”，所以面对这样的作品，仍然能拍着胸脯说自己熟知鸦片战争的人恐怕寥寥无几。相反，如果说这是值得中学生和大学教授都看一看的书，大概不算溢美之辞。

二

东方——西方的文化比较，历史——现实的回视与反思，构成了作者在书中所确立的认识框架的两条主轴。而他们为自己的全部理论观念所选定的立足点，正准确地落在这一纵一横两条主轴交叉的中心点上。

视角开辟之后，立足点是格外重要的。它的倾斜将导致观念的偏颇，致使无论多么新颖的见解都难于接近真理。譬如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在过去的百年里不止一次地抵达过两个极端，而且直到前两年还时有争论。这不过是因为论者们分别站在或东方或西方的文化立场上发言，而彼此都抱定排他的信念。若以此种态度观照鸦片战争，那么历史面貌极易被为我所用地梳妆打扮：或从单纯的民族感情出发，以朴素的、排他性的民族防卫意识对它作出不可能完整的解释，具体表现为只强调战争使中国人民无端蒙受的屈辱，而不正视战争中的东西方文化撞击所固有的客观上的进步意义；

或把西方文明作为既定模式，而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百般挑剔，以至于淡漠和忽视这场战争鲜明的政治性内容，甚而丧失了对道德是非的基本判断……这两种意见相左的论者，分别出自不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延续，有时也存在于同一时代），却不约而同地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他们实际上程度不同地都在情绪化地评价历史，却忘记了历史不仅需要冷静的思考，而且需要健全成熟的理性。

现在，我以为在本书中毫无疑问地看到了这种成熟的理性之光。作者宣称，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顽固守旧。由此，他们获得了一种不带成见的开放眼光，也拥有了一种豁达大度的雅量。依照他们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传统悠久而令人敬仰的文明（尽管它也如一切文明一样存在若干弱点），而西方文化却是另一种全然异质的文明。鸦片战争使这两种文明在互不了解的前提下遭遇（由于彼此陌生，其中很多冲突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所造成的灾难是人类文明的悲剧，然而它引发的文化后果却属于正剧的内容。在这里，作者并不回避必要的政治和道德判断，但却更加注重两种文化性格的比较分析。他们爱慕中国文化的合乎人类理想规范的善良，却又为其当时那种固执的守旧而悲哀；他们钦羡西方文化的进取精神所促成的物质文明，却又厌恶这种文明与生俱来的伪善而骄横的面孔。于此，作者便将自己置身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空地带，也即一个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上。我以为，这种立场正是具有成熟理性的作者所必须选择的。因为无论他内心中怀有怎样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他都只有如此，才不致成为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近视眼。

另一方面，在历史——现实这条主轴线上，作者也牢牢地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这种位置的择定，主要是从他们描述和剖析历史时所持有的分寸上体现出来。人所共知，对待历史，须“钻进去，爬出来”，方能获得真知。所谓“钻进去”，即是要不脱离历史环境地以“历史眼光”考察事物；所谓“爬出来”，即是要站在今人的思想高度以“现实眼光”去回视历史。这两种眼光是不可或缺的。若仅依前者，那么就会片面强调历史条件制约下的种种合理性，作品难于获得现实的高度，而且极易导致鲁迅当年所抨击过的“天朝心态”的死而复生。反之，若唯靠后者，那么就会以今人的标准苛求古人，发展到极端，则导致轻率地、不负责任地否定历史。因此，本书作者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上述弊端，不仅将两种“眼光”融合为一，而且恰如其分地将其加以运用。这里，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得心应手的驾驭能力，而且展露出他们在历史面前博大而宽厚的胸襟——这在本质上，便是一种睿智和良知的双重体现。同时，他们面对现实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也渗透在字里行间。我以为，正是由于“历史眼光”的观照，他们才能对我们古老的民族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某些缺陷，仍然在联系历史背景的分析中，给予那么多善意的理解；才能在忠于历史地指出林则徐的若干局限性(这是以往同类著作中鲜见的)的同时，对这位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寄予那么多的崇敬之情。同样，正是由于“现实眼光”的回视，才能使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在我们祖国通过改革开放踏上现代化进程的今天，反对因循守旧至少是与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同样重要的。

两种眼光的结合为客观的历史评价提供了可能。人的良知、

成熟的理性和清醒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又驱使作者以本来面目勾画历史。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史笔”精神，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虚美、不隐恶，不从既定的观念出发而为贤者讳；不虚妄、不矫饰，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甚至不急于得出什么结论，不勉强地向人们灌输什么观念。他们以全身心关注的，似乎只是历史的原貌。他们只想不走样、不变形并且尽可能完整地告诉读者“昨天”的事情。但唯其如此，人们才能通过了解昨天，思考今天，展望明天。

三

作为全景式的报告文学，本书可谓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但也不必讳言，它的故事性并不很强。由于作者对历史的忠实，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主观随意性的描述，所有场景的展现均依赖史料的连缀。这使作品中一些本该由小说家们大加渲染以便赚取读者眼泪的场面变得只剩下寥寥几笔的粗线条勾勒。在文学意义上，这似乎是可惜的。但是，与由于随意虚构而被人们讥之为胡编乱造的客观效果相比，这种轻微的损失又实在值得。特别是从社会效益上看，在我们大多数读者尚未真正全面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之时，我以为那种为追求文学效果而虚构历史的作品还是少些为好。

然而，作品毕竟是艺术化的。作者以敏感的艺术洞察力，在史料的重重束缚下尽可能地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他们依靠对史料的剪裁、筛选和重组，仍使一些历史人物的性格得以凸现。有些形象的鲜明度，甚至不逊色于某些热衷于虚构的历史小说中的形象。如林则徐的刚毅、果敢、勤政爱民，深明大义、头脑清醒、

审时度势精通为官为臣之道以及在强敌面前的英雄气概；如道光皇帝作为个人的“清”、“慎”、“勤”的品格以及他面对那个不清、不慎、不勤的王朝时的无能为力，作者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还有那位以“文明”的、“人道”的面孔呼唤野蛮的、反人道的战争的英国领事义律，那位以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身份在《南京条约》签订前与英国人不卑不亢地巧妙周旋的张喜，作为艺术形象也都鲜活生动，呼之欲出。至于其他显露出性格特征的人物，书中还有许多。我想，这真难为了作者的苦心经营，但转念又觉得不能排除作者纯属妙手偶得的可能性。因为言必有据的写法，或许表明作者更多地看重本书的认识价值而并不以艺术审美价值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假如果真如此，那么除了证明历史本身就像文学一样生动而丰富以外，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般的艺术形象塑造，则正巧反映出作者的艺术功力之所在。

在语言表述方面，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将生动而富有趣味的细节与精辟而启人心智的议论相结合。本来，在通常的意义上，文学反对理念化、排斥议论。但在这里，议论却不仅成为不可缺少的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文学增色。这大概是由于作者的议论既不枯燥乏味又不流俗落套的缘故。在作品中，有时这议论是画龙点睛式的，三言五语，点到为止，却常能出奇制胜；有时这议论是铺张扬厉的，但在那飞瀑般倾泻的气势不凡的言词中，密集地聚积着令人耳目一新的信息。因而这样的议论是不会令人厌倦的，它只会增强作品引人入胜的效果。它是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深切感悟和透彻洞悉的结果，所显示的与其说是文学和艺术的不如说是智慧和理性的魅力。

写到此处，应当打住了。余下的，便是我需要坦白地承认，我遵作者之嘱斗胆作序，实是勉为其难。因为在这样一部内容丰厚、思想深邃的大气魄、大手笔的作品面前，我受才、学、识之所限，惟恐搜肠刮肚仍言不尽意。但我仍以此文悬疣书端，是因为我相信公正的读者将会超越我狭窄的视野和思路，给它以更加切实的评价。这正像我相信历史的真知和时代的责任心，必得将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共鸣一样。

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五日于北京

前　　言

一个全身心关注现实的人，突然一日，却对一百五十年前的旧事格外地关心起来。这似乎不是兴趣所至，而是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引导着我。似乎有理由相信，在社会历史生活的领域里，思想者永远难以走向预期的目的地，无尽的新大陆不断逼令我们放弃旧有的精神教条——不是特定的某一种，而是许多许多。人的理性像个不知足的孩子，永远有新鲜的东西引诱着他的好奇心。那些过去并不为我们重视的东西，突然一天会变得十分重要起来，吸引曾经对它表示过不屑一顾的神情的人们。或许，思想就是在这里超越岁月的局限，有益的新发现就这样丰富着我们对今天的理解和对明天的仰望。

其实，不论个人还是社会，他(它)天生的弱点之一便是急功近利。因此，天性常常束缚着我们的注意力于眼前的东西，使我们缺少人类自我认识必须的未来和历史的目光。一旦在这里挣脱一点羁绊，那么，徜徉于岁月的长廊中，环游于理性的完整过程中，我们便会从容、平静、中肯地面对眼前大大小小的一切问题和矛盾。

沉思会减少争吵，理智能弱化情绪。正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渴望和社会认识的规律一起，驾驭着我走向昨天。

这不是反方向的旅行。

鸦片战争！这似乎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名词之一。对于每一个有过最简单的受教育史的中国人来说，对这个名词大约都不能说是陌生的。在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不同学龄级别的教科书中，在党支部书记、连队指导员的政治课中，在各级党报的社论中，在那些从来没有权威过却从来都在权威着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我们一再地领略过这四个字承载的巨大的痛苦、屈辱和义愤。

不过，尽管它使我们的民族情怀那样地翻江倒海，难以平静，事实似乎是简单而清楚的：一个腐败的清政府；一个发起不义战争的英帝国；一次毫无疑义的失败；一段民族灾难史的首頁……。

然而，当我带着意识的新鲜感，埋首于尘封雾罩中的档案文献，翻检那些被岁月过早地抛弃了的琐事和细节，端详着事件中那群或贵或贱，或显或隐，似曾相识又觉全然陌生的人物，顺藤摸瓜地瞻仰我们民族更为遥远的过去，发现的惊叹不时使我抚案无语。

你能相信吗？

——因为一个见面礼的争执，竟然会使一趟耗资巨万、漂洋过海的国事访问泡汤；因为一个女人之当留当去，拥有数千万银子贸易的两个国家竟然能断绝交往半年之久；民族英雄关天培，是在守军溃败中，以自杀般的无奈呼然倒在铁炮身旁；三元里义军的起事，导火线是英军强奸了村中一白发老妪；著名的“投降派”代表人物琦善，却是一个在官场上远远要比林则徐饱经起落折磨的不幸者；被视为战争结局也是中国近代史象征的《南京条约》，是一个满洲贵族管家多方周旋的产物；战争的胜方，在向败方慎重地要求“平等”……

然而，这都是历史事实。

往往，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新闻。

事情还深刻在，它们都不是无意义的巧合或偶然，它们也仅仅是我们民族文化燃烧的闪光和火星，一切都是整个地球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越是超越战争来看这场战争，越是环顾悠长的两头来看鸦片战争这个焦点，我们越有理由相信：这是人类文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形式的全面冲撞，甚至包含着文明之间必然的历史性误会。当然，文明的优劣，并不是一场打打停停的三年战争能够证明的。

在力图超越具体是非的考察中，我甚至认为可以断言：不从东西方文化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重新了解鸦片战争，我们就难以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世界，一个中国人也就难以了解今天的自己和自己的意识、情感。

不是么？家庭里的婆媳不和，内阁中的施政争论，街巷村里的世风之叹，文人学者的古今轻重，以及画家刘海粟一生中所遇的二次“模特儿”事件，已经进行了十来年依然跋涉在风风雨雨中的“改革开放”……，哪一宗哪一件，我们能够离开鸦片战争这一源头给予它们确切可靠的评说呢？

哦，鸦片战争！我们有着不能再多的理由来更深刻地记忆这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千古名词。我似乎也有理由相信，笔者在本书中提供的内容，会使我的读者理解：作者有着不能再多的理由发此感慨。

历史不容闲情。

采访历史是困难的，尽管我们有着面对历史的诚实与辛勤。表现历史是更其困难的，尤其是当我们从今天和明天的停泊地

向历史出发的时候。然而，不论面对今天的生活还是面对过去的旧事，我们发现，事实的逻辑本身，就有着排斥着意“创作”的最高表现力。因此，动笔之时，笔者一再地提醒自己：约束思维的复杂，借助事实或故事的朴素、明朗，邀请读者与笔者一起，凭借今天的经验去感知昨天的事情的缘由、曲直。文化和文明没有绝对的今天和昨天，同一种血液能使我们的意识能力以一贯之。并且，我相信真正的社会道理，一定不在晦涩的逻辑证明中，而是在那些正常的人们都可以理解的事实的逻辑中。

历史具备这种功能。

传播的条件下，我们处在一个大众的时代。

于是，我小心地绕过了这个“学”那个“学”，努力把丰富的材料叙述成自然的故事，而不生硬地用作“证明”；我尽量绕过那些门类庞杂却大同小异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在原始资料的大海中耐心地捞取，以我对这段历史的理性理解，以我所看到的这段历史的全貌，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我希望因此而使这部著作为读者所欢迎——便于阅读，也便于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和思想。

或许，我已经不需要对我的认识进行专门的概括。叙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仅仅需要提出的是：今天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的重大课题需要探讨。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地关心着自己社会的前途。那么，在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论人们怎样被不同的观念和利益趋向所区分，或许大家都不否认——中国社会如何安全、快速地迈向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社会，是我们所面对的第一课题。那么，这一课题的理性起点在哪里呢？

显然，我们今天所关心的问题，或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课题，在我们的祖先不得不面对一百五十年前船坚炮利的“英夷”时就已经提出和面对了。鸦片战争，使我们完全依着自己的生长规律循环了几千年的文明一下子要生存在不光有着自己，而且还有风貌迥异的别人的世界系统中了，于是，我们这个民族才有了它自身循环过程之外的痛苦、磨难、失落、希望。于是，背负着辉煌历史的中国，不得不步履艰难地面对世界，脱离自己原有的轨道，向着一个新的方向。

这样看来，从“那天”到今天，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一个仍然没有终结的文明自我更新的过程中。也正是在翻检那些已经被大多数中国人所不知的祖先的旧事时，我不得不一次次兴奋又惆怅地感叹：尽管岁月已使纸片儿发黄发脆，尽管祖宗的文字似不如“夷人”的笔记易读易懂，但那些误会、矛盾、对抗以及它们产生的理由，似乎还难以说已经是历史。一切好像都发生在昨天。

这是一种树大根深的文明的顽强。

这也正体现着这个文明的伟大辉煌。